



历史知识读物

蔡 特 金

丁 建 弘

LISHI ZHISHI DUW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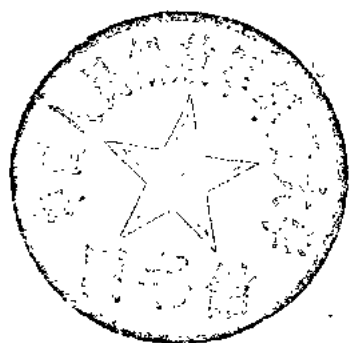
商 务 印 书 馆

2 035 8366 6

历史知识读物

蔡 特 金

丁 建 弘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1974 年 • 北京

913

55/13

历史知识读物

蔡 特 金

丁 建 弘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人民路36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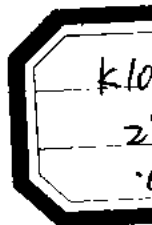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装

787×1092毫米1/32 1⁵/₈，印张 25千字

1974年1月新1版 197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17·330 定价：0.11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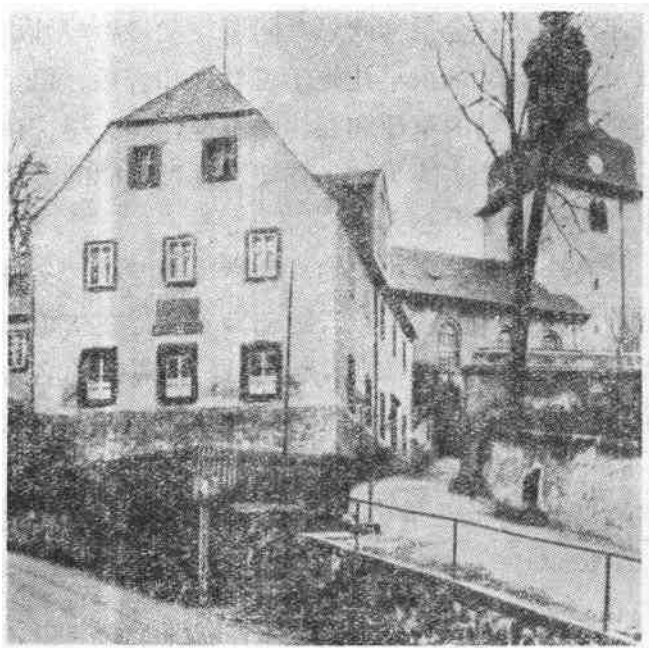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一	少年时代·····	1
二	走上革命的道路·····	5
三	流亡巴黎·····	9
四	高举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旗帜·····	16
五	社会民主党左派·····	25
六	反对帝国主义战争·····	34
七	站在有生命力的地方战斗·····	38
八	反对法西斯主义·····	43
九	伟大的一生·····	46

一 少年时代

德国萨克森邦埃尔茨山脉的山脚，有一座小小的村落——菲德劳，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和牧场，小河从村前流过，风景美丽宜人。在这里居住的，除了少数几



蔡特金的故乡菲德劳村

个富有的农民和手工业师傅外，其他都是贫穷的织袜工和家庭手工业者。

1857年7月5日，德国伟大的女革命家克拉拉·蔡特金就诞生在这里。她的父亲哥特弗里特-艾斯纳是本地唯一的乡村学校教员。他拉得一手好提琴，还充当教堂的乐师。母亲出身于来比锡的市民家庭，受过高等教育，喜欢接触当代的文学和艺术问题。他们几乎对一切政治新闻都感兴趣。

年幼的蔡特金很喜欢思考问题。父母希望她成为女教员，因此，父亲很早让她学习教课和音乐。但是蔡特金喜欢在广阔的草原和森林中游逛，爬大树，跳大沟，捉迷藏，和壮实的男孩子打架。在孩子们的各种争辩中，她经常是中心人物。

蔡特金也非常喜欢读书，往往读到深夜。父母担心她的健康，把灯藏了起来，她就捧着书蹲在壁炉旁借火光阅读。少年时代，她就读了歌德、席勒^①的名著和古希腊荷马的史诗，还阅览了莎士比亚、拜伦和狄更斯^②的一些作品。蔡特金特别喜欢当时的两部禁书，一本是《瑞士解放斗争史》，一本是《法国革命史》。她崇

① 歌德(1749—1832年)、席勒(1759—1805年)都是德国著名诗人。

② 莎士比亚(1564—1616年)是英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；拜伦(1788—1824年)是英国诗人；狄更斯(1812—1870年)是英国小说家。

拜瑞士的勇士，向往革命。她把这些故事改编成战斗游戏。在这些战斗游戏中，这个身材矮小、富有活力的女孩曾经上百次地演过文克里特（他是为瑞士的自由和解放而献身的勇士）之死。

蔡特金的同伴都是些穷苦家庭的孩子。他们唱的山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

“早晨土豆充充饥，
中午土豆白水煮，
晚上土豆带皮啃，
土豆土豆加土豆。”

为什么人有穷有富？为什么富人不做事吃得好穿得好，而织袜工人却是那样苦？《圣经》上找不到答案，父母也不能透彻地解答这些问题。幼年的蔡特金只能认识到这一步：有些事情肯定是不对的。

1870—1871年发生了普法战争。普鲁士打败了法国，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。资本主义开始在德国迅速发展。菲德劳村的人也开始流往城市，因为那里需要大批的劳动力。1871年末，艾斯纳也带着全家迁到来比锡，以便蔡特金上城市中学，那时蔡特金满了十五岁。

来比锡是当时德国的文化和工商业的中心，科学、艺术、教育和出版事业都很发达。到来比锡之后，父亲

要蔡特金考一个有名的师范学校，她却把时间花在戏院里。她对《浮士德》、《哀格蒙特》、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奥赛罗》^①着了迷。母亲忧虑地把这种情况告诉她的朋友施密特女士。施密特是一位颇有名望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家和教育家，她让蔡特金在她办的师范学校里免费受教育。从此，蔡特金就开始在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很浓的学校里学习。

她在这里学习了四年，读了不少书，特别在外国语方面，有了不少的长进。更重要的是，她不断接触资本主义城市的实际生活，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多了。每次和教师一起散步时，她总是留意街上的卖报孩子和乞丐。在戏院里，她仔细观察那些衣着华丽的高贵妇女。她觉得世道太不公正了，难道饥饿和贫困也是命定的吗？蔡特金拿这些问题去请教校长施密特。施密特却开玩笑地把她叫做“世界改造者”，避开对这些问题的解答。

有一次，她偶尔看到社会民主党出版的一些报纸，在报上第一次读到了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。从那时起，她开始注意阅读社会主义政党的传单和小册子，读这个党的领袖奥古斯特·倍倍尔以及威廉·李卜克内西

^① 《浮士德》、《哀格蒙特》是歌德的著名剧本。《哈姆雷特》、《奥赛罗》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剧本。

的演说词。工人阶级反对统治者的大无畏的声音往往使她兴奋得彻夜不眠。解决贫困的出路在她思想上渐渐明朗化了，那就是必须推翻剥削制度。她开始热烈地拥护社会主义。施密特学校的教师后来回忆当时的蔡特金说：“她拥护社会主义理想时，热情、机智而明确。”

二 走上革命的道路

1878年，蔡特金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国家女教师的考试。母亲和施密特校长都带着骄傲和兴奋的心情拥抱她，说她从此会有一个“锦绣前程”。但是蔡特金却决定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穷苦的工人和农民。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，她结识了一群俄国的流亡者和大学生，她的一位俄国女朋友瓦尔瓦拉说，这些人能够帮助她。可是蔡特金很快就发现，这些年轻的无组织的俄国人，虽然不停地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，朗诵革命诗句，咏唱怀念祖国的伤感歌曲，却缺乏真正的实践力量。一天晚上，他们一起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一次公开集会，她第一次接触到德国工人，并且惊异地听到，工人把“铁血宰相”俾斯麦——当时被资产阶级捧上天的“民族英雄”——叫做“屠夫”，说他害

怕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。这种勇敢的行为和言论使蔡特金受到巨大的启发：伟大的力量存在于有组织的工人当中。

当时，蔡特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不深的。从这年秋天遇见俄国革命家欧西勃后，她才踏上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。欧西勃是一个俄国流亡者，高高的个儿，有着一对深沉的灰色眼睛。他和前面所说的那些俄国人不同，他根本不相信幻想和美丽的言辞能够改造世界，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，才能改造世界。欧西勃名义上是一个木匠，实际上是一个革命者。他经常精心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。他很喜欢蔡特金，因为她有革命的抱负和坚毅的性格。他介绍她读《共产党宣言》和马克思、恩格斯的其他著作。蔡特金得到这些书籍后，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，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，一直到读懂了为止。她从幼年时就存在的疑问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。她懂得了什么叫剥削，什么叫剩余价值，什么是穷人的真正出路。

欧西勃常带她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集会，听威廉·李卜克内西的报告。一个年轻的姑娘坐在男人中间，而且热情地参加讨论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

母亲强烈反对女儿接近社会民主党人，把她锁在

房里。施密特校长还用威胁的口吻对蔡特金说，如果她不和那些“下贱的破坏者”脱离，那就和她断绝师生关系。但是蔡特金坚定的政治信仰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感情，她含着泪激动地对施密特说：“我不能违反我的信念。”就在1878年，她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。

蔡特金是在暴风雨的年月里加入工人阶级革命行列的。

1878年10月，俾斯麦在国会中通过了所谓“反对社会民主党违反治安的法令”（又称“非常法”或“反社会党人法”），他企图用恐怖手段镇压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活动。根据这一法令，工人的组织被解散，工人的报纸被封禁，工人领袖有的被监禁，有的被驱逐出境。党被迫转入地下。困难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没有吓倒蔡特金，她接受党交给的任务，为“非常法”的受害者募钱，以便接济流亡者和他们的家属。蔡特金每天挨家挨户、楼上楼下跑个不停。当她捐到钱时，就高兴得把自己的微小的成绩告诉俄国朋友们。

为党工作是义务的，蔡特金必须找一个职业才能糊口。她当了一个工厂主的女儿的家庭教师，利用有限的空余时间继续为党工作。

蔡特金非常喜爱自己的教师职业。她以自己学到的新知识，结合动人的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学生，有时还

讲给仆人、厨师、看门人听。那个脑满肠肥的主人察觉到这一点，要她马上停止作这种“革命的煽动演说”。她和主人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。一天，当主人粗暴地把一个穷人赶出屋时，在场的蔡特金十分愤慨，她冲到主人的跟前说，如果群众激怒了，要把你吊在路灯柱上，我决不为你求情。主人一怒之下，立刻把她解雇了，她只好另谋生计。

1881年，根据“非常法”条例，来比锡宣布戒严。第一批被逮捕的人里就有欧西勃，后来他被赶出德国。在一个黑暗的夜晚，蔡特金一直把他送到国境线。她的这位最初的政治导师和亲密战友的形象，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她的心里。

不久，蔡特金也离开了德国，因为她也有被逮捕的危险。她开始在奥地利，后来在意大利当家庭教师。1882年夏天，由于瓦尔瓦拉和其他朋友的邀约，她来到了瑞士的苏黎世——传奇英雄文克里特的故乡。

在美丽的苏黎世，当时集中了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，党的机关报《社会民主党人》就在这里出版，并从这里秘密运入德国。在恩格斯的帮助和指导下，这份报纸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。开始，蔡特金参加报纸的编排工作，后来由于需要，她作了莫特勒的助手。

莫特勒是秘密运送《社会民主党人》报的领导者。

这个人既勇敢又机智，很有组织才能。他能和警察厅、税务厅、国境巡查所以及德国派来的密探周旋自如，在艰苦环境中顺利地把报纸运进德国。同志们把他叫做“红色战地邮政局长”。开始，他对这位助手不免有点顾虑：一个年轻姑娘，又没有为党工作的经验，行吗？但是蔡特金的工作热情、能力和无畏精神很快使他感到满意。她工作敏捷，性格顽强。她帮着四处通讯接线，解答各种各样问题；帮着包扎报刊，秘密发送，处理得井井有条。在这种政治锻炼中，她逐渐老练起来。她已经能够很快地识别出谁是特务和密探，并且想法捉弄他们，要是捉弄成功了，她便乐得哈哈大笑。有时，她也来到国境线上，帮助同志们偷运报纸。

三 流亡巴黎

1882年11月，蔡特金移居巴黎。在那儿，她和欧西勃结了婚。

夫妇俩住在蒙马特尔区的一间狭窄而又阴暗的房子里，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。欧西勃靠翻译和写文章得来的报酬，还不够养活一个人。为了维持家庭生活，蔡特金就试着做一些临时的翻译工作和教课。两年后，他们有了两个男孩：马克西姆和柯斯加。小家伙给家

庭带来新的生气，也增添了贫困和忧愁。为了应付分娩和孩子的用度，蔡特金日夜工作，努力翻译，去图书馆阅览，教课，还要料理家务。在第一个孩子即将临盆时，每天还得为生活而奔波。

家里缺少最必需的家具，有时还得挨饿。他们没有钱买衣服，后来连仅有的一点家当也送进了当铺。蔡特金自己只能披着一个大披肩，遮盖里面的破衣服。后来，因为他们常常付不出房租，终于被房东赶了出去。夫妇俩各人手中抱着一个孩子，坐在市中心公园的长凳上



流亡巴黎时的蔡特金

忍受着无家可归的痛苦。幸亏得到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帮助，他们才没有在公园里过夜。她亲身经历了无产者妇女的艰苦生活，使她变得更加坚强了。

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巴黎，是国际流亡者的集中地之一。在这些流亡者当中，有马克思主义者，也有空

想社会主义者、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，他们之间经常展开论战。蔡特金加入俄国流亡者小组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团体，她和丈夫一起，在流亡巴黎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当时，她经常参加激烈的争辩，热情地发表意见。

蔡特金从早到晚忙碌着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她要参加政治活动，要学习理论，要料理家务。深夜，她还必须坐在灯下帮助丈夫撰稿，因为欧西勃当时是《社会民主党人》报驻巴黎的通讯员，同时是维也纳《平等报》和《柏林人民论坛》报的通讯员，他忙不过来。蔡特金写文章有一个准则，就是要做到透彻钻研，思想明确。每写一篇文章之前，她总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，掌握文章中的深刻思想和伟大的实践力量。她还经常跑到贫民区去访问。她非常了解圣·安东区（巴黎工人区）一带那些阴暗潮湿的出租房子和它们的住户。因此，她的通讯总给人一种清新、鲜明和逼真的感觉。她这时写的通讯经常用她丈夫的名义发表。

在巴黎流亡的几年中，蔡特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，而且和法国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蔡特金夫妇积极参加了法国工人运动。他们结识了许多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，像工人党领袖

拉法格、盖德和《国际歌》的作者鲍狄埃等。蔡特金和拉法格夫人劳拉（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）就像姊妹一样。当时，法国工人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盖德派和改良主义的“可能派”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。为了更有效地争取群众，蔡特金和劳拉建议办一份报纸。这个建议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。没有多少日子，法国工人党创办的《社会主义者》报出版了。蔡特金和劳拉每天都要亲自把报带到工人区赠送，回来的时候，就沿途向售报亭打听《社会主义者》的销售情况。她们想尽办法扩大这份报纸的销路。

蔡特金几乎每年都参加巴黎的五月示威。她总是走在前排的红旗下面，唱着战斗的歌前往拉雪兹墓地，向在这里英勇牺牲的巴黎公社社员致敬。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，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热情的年轻妇女竟是一个德国人。

有一次，游行队伍和警察发生了搏斗。戴着尖顶盔的警察，像疯狗一样向工人冲来。蔡特金和工人们高呼着“公社万岁！”徒手上前迎战。突然，她觉得脚下一阵麻木，倒下去了，脚被马刀砍中，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后来，她得到工人群众的保护，终于忍着伤痛回到了自己家里，苍白的脸上依然浮现着骄傲的笑容。

蔡特金就是这样和法国工人运动结成了血肉的

联系。

八十年代里，蔡特金曾一度返回来比锡。她在巴黎活动的声誉已经在德国工人中广泛流传着，谁都想见见她。她在来比锡做了一次报告，介绍巴黎工人的斗争。这是她第一次上台讲话，她的讲话的内容受到了德国工人的热烈欢迎。她还冒着危险参加了许多次秘密集会，做了不少宣传工作。几个月后，当她再动身去巴黎时，大批德国工人拥到车站来送行，有人还高呼“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”。警察也匆匆赶来，他们以为一定是在送倍倍尔或者威廉·李卜克内西。当看见车厢里只是一位三十岁上下、穿著朴素的妇女时，他们显得十分迷惑不解。

1889年初，欧西勃死了，他是被长期的困苦和劳累拖垮的，开始是肺结核，接着两腿瘫痪〔tānhuàn〕，完全失去工作能力。欧西勃的死是对蔡特金的重大打击，但是她没有被痛苦所压倒，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，她毅然负起全部生活和工作的重担。

国际工人运动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各国工人党新的联合组织——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。

这件大事使蔡特金感到特别兴奋，她满怀热情地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。为了使劳动妇女从思想上了解这次大会的意义，她在《柏林人民论坛》报上发表了